

国外汉语研究丛书
吕必松 主编

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选

主编 大河内 康宪
副主编 施光亨
译文审校 靳卫卫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国外汉语研究丛书

吕必松 主编

日本近、现代汉语 研究论文选

主 编 大河内 康宪

副 主 编 施 光 亨

译文审校 靳 卫 卫

1993.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汇集了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和词汇研究的部分成果,为中国学者、汉语研究工作者了解日本同行们的业绩开启了又一窗口。本书主编大河内康宪教授在序言中认为,在日本,区别于传统的“汉文研究”、把汉语作为外语来研究的历史起始于二次大战后,到了八十年代,第三代新人崛起,开始了从语用学的角度考察汉语的新途径,同时注意一些细微问题的研究,使得研究工作不断深化。本书除收录了三数老一代学者的力作外,重点展示了日本第三代汉语学者的成果。中国学者们将从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看到今后一个时期内日本汉语研究的大趋势。

(京)新登字 157 号

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选

大河内 康宪 主 编

施 光 亨 副 主 编

靳 卫 卫 译文审校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4.25 印张 373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619-0367-7/H·256

定价:11.50 元

序 言

大河内 康宪

这里收录的论文，除了开头的两篇和我的一篇以外，其余均为日本较年轻的汉语学者所作。就研究领域而言，都是关于近、现代汉语语法和词汇的。

近年来，在日本发表的有关汉语的论文及文章每年达 200～300 篇。其概要可在各年发行的《日本中国学会报》的“学会展望”栏中查得，其中仅研究论文就多达近 100 篇。积数十年之久，数目相当可观。收入这本集子的只是其中的 25 篇。因此，有必要说明一下这 25 篇论文在那些众多的论文中所处的位置。

日本的汉语研究——它反映了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这一特征——具有作为外语研究的不寻常的历史。除去近 150 年，历史上日本的主要学问就是国学、汉学和佛学。这些学问都是受到中国文化巨大影响的产物。顾名思义，其中汉学就是传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主要是对中国儒学和汉诗文的研究，与此同时，汉学也是日本广大的知识阶层所必备的文化教养。17 世纪以后，儒学已不仅仅是一门学问，而且已发展成为支持当时的统治者江户幕府政策的主要政治思想。儒学家和国学家一道，在当时的社会里起了指导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汉学家、儒学家和知识阶层人士在读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著作时的方法。他们用的是“汉文训读”法。所谓“汉文训读”是一种极其奇特的方法，它利用自古以来日语借用汉字来标记的特点，用日语念诵中国古典著作的汉字，而后在此基础上，再按日语的语序加以排列。其读音是通过在汉字的周围标上各种符号来表示的。与汉字和假名混写的一般日文相对，全部用汉字书写的中文被称为“汉文”。不懂作为外语的汉语，甚至连中国人讲话都没有听过的古代日本人，就是依靠这种方法来读懂古汉语文献的。除了最近的几十

年,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几乎完全就是靠这种“汉文训读”法来理解中国古典原著的历史。因此,日本的汉语研究、汉语教育,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差不多就是“汉文”研究、“汉文”教育的历史。当然,其研究都是围绕汉文训读展开的,跟现在所说的外语研究性质迥然不同。它的主要内容是训读困难的汉语助字和对这种训读法本身的研究。著名的日本语法学家松下大三郎、大槻文彦等在著撰日语语法书的同时,还撰有汉语语法书。这说明“汉文”一直被认为是日文的一种变形。

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严格地说在日本把汉语作为一种外语来进行研究,还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事情。二次大战后,日本一反从前“汉文”教育的传统,把汉语教育纳入了大学的外语教育课程。汉语同英、德、法语一样,已作为一种重要的外语为人们所认识。在大学的一般教育课程中,很多学生为了了解中国文化,正在把现代汉语作为一门外语来学习。以往大学里的“汉文系”如今改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系”。由此开始,这种趋势随着日中两国间交流的发展、关系的密切已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大学里配备了许多担任汉语教学的教员。这些汉语教员从教学需要出发,开始对汉语进行研究,形成了日本的现代汉语研究。当然,其基础有漫长的“汉文”时代留下来的研究成果;也有明治以后对学问感兴趣而加入到现代汉语研究行列中来的有识之士的努力;另外,还有日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化所具有的素养和高度关心,这是别的外国文化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在此基础上,二次大战后对汉语、特别是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得到了飞速、广泛的发展。现在,在日本有主要由大学的汉语教员组成的学术组织“日本中国语学会”,会员人数达700名之多。此外,还有继承传统汉文研究体系的“日本中国学会”。这些学会的会员是现代日本汉语研究的主力军。

以年龄段来划分,日本战后的汉语研究先后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代人:第一代人是二次大战后日本新的汉语研究的奠基人。就语

法研究而言，第一代人在二次大战之前就开始学习现代汉语，并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二次大战之后受中国王力、吕叔湘等人研究成果的启发，开始对现代汉语的实际进行考察研究。他们深刻理解汉语的特点，开辟了研究汉语的方向。随后，出现了二次大战后的第二代人。50、60年代，在新中国的语言政策鼓舞下，汉语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这第二代人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开始了汉语的研究。不过，他们在对问题的认识上比前辈人视野更开阔，不仅仅停留在对汉语特点的主张上，而且更关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汉语。80年代以后开始从事汉语研究的是第三代人。跟对中国其它方面的研究一样，进入这个时代，汉语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并且开辟了从语用学的新角度重新考察汉语的新途径。本《论文选》介绍的正是这些比较年轻的第三代人的汉语研究成果。第三代人在开拓此前一直被忽视的新领域的同时，开始涉及一些细微问题的研究，使研究不断地得以深化。透过这种新的研究动向，我们可以展望今后日本的汉语研究趋势。

由于编者能力所限，本《论文选》没有收入有关音韵史和古汉语的研究论文。编者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汉语语法，因此缺乏很好的评价音韵史和古汉语领域优秀论文资格。我想今后定会在当之无愧的编者主持下，另行筹划的。

一般说来，日本的汉语研究有些什么特点呢？略陈管见，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纵观历史，在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古典研究传统十分悠久。因此，虽说是把现代汉语当作外语来研究，但往往带有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这一特点。比起其他外语来，汉语的历时性研究占优势，共时性研究比较薄弱。现代汉语的研究常与古典相联系，时而受到批评，时而受到赞扬。然而，这可以说是汉语研究中所具有的一种共性，在中国也明显地有这种倾向。

第二，日本的汉语研究，追随中国研究潮流的居多。具体说，在

大篇幅地介绍中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稍许补充一点儿个人意见,这样的论文居多;而以独到的见解,对汉语语言事实重新进行整理、归纳,论述汉语本身所隐含的特点的论文较少。不仅汉语研究如此,其它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这种情况本源于日本人的治学传统;日本人的治学传统认为与其致力于提出自己的主张,不如去理解他人的见解。据说江户时代日本对牵牛花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其结果,牵牛花的品种改良进步了,却没有发现遗传规律。不,或许发现了,但没有发表。日本社会一般认为,与其跟他人智力竞争中展示其抽象的成果,不如率先获得现实、具体的成果更有意义,更受人尊敬。

第三,缺乏同母语——日语之间的对比研究。这不仅是对汉语,对其它外语也是如此。在日本只是把学习外语作为接受、理解外国文化的一种工具,而对其语言本身的研究却很少表现出兴味。就汉语来说,明治以后与中国人接触的日本人不少,但是在交流中,致力于对现代汉语本身研究的人却非常之少。这同欧洲传教士关心现代语言,并留下许多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为此,在选编本论文集时,我尽可能地选择具有下列特色而少带或不带上述诸点影响的论文:(1)不追随中国潮流,具有独创见解;(2)不受传统研究模式的束缚,把汉语作为一种语言独立地加以考察的;(3)从对日本人进行汉语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而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等等。无论怎么说,同在中国进行的研究相比较而言,这些论文还不成熟,而且规模很小。不过,如果通过本《论文选》能看到日本青年学者的研究动向,感觉到他们的研究热情的话,我们将感到十分荣幸。

这是一次较完整地介绍日本汉语研究成果的尝试。世界汉语研究者会聚一堂,交流研究成果的机会正不断增多,我衷心祝愿本《论文选》能汇入这个大潮,并对此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靳卫卫译】

目 录

序言	大河内 康宪(1)
1. 东亚语言结构的起源: 东亚和东南亚语言的地域性演变 和历时性发展	桥本 万太郎(1)
2. 汉语的使成复合动词形成过程之研究	志村 良治(12)
3. “难道”小考	佐藤 晴彦(42)
4. 近代汉语所见否定副词	植田 均(52)
5. “亲嘴”的“嘴”是谁的“嘴”?	相原 茂(82)
6. 汉语动词意义中的阶段性	荒川 清秀(107)
7. “知道,明白,懂得”的义素辨析	大滝 幸子(118)
8. 现代汉语中的主主动补结构 与宾主动补结构	今井 敬子(138)
9. 形容词补语句中的指示与语义关系 ——“过分”义现象的再考察	岩崎 皇(150)
10. 动补动词的形成	望月 圭子(162)
11. 从“V+在~”句式看有关静态动词的 一些问题	平井 和之(179)
12. 汉语趋向性复合动词与处所宾语	鹤殿 伦次(197)
13. “有饭吃”格式中N(饭)与VP(吃)间的 关系	原 由起子(218)

14. 谈“在”
——从其相关成分谈起 泽田 启二(231)
15. 处置与遭遇
——再论 S(把) 杉村 博文(254)
16. 关于介词“连” 高桥 弥宇彦(277)
17. 试论条件句“等~” 内藤 正子(295)
18. 汉语副词“都”的语境分析及语气分析 ... 中川 千枝子(309)
19. 日语和汉语中的依存性名词 中川 正之(323)
20. 汉语的姓名连锁及其代词的功能 山崎 直树(336)
21. 汉语的“无定名词主语句”
——另外一种“存现句” 内田 庆市(351)
22. 语用上的具体化与一般化
——从所谓“无定 NP 主语句”与“存在句”
说起 濑井 唯允(363)
23. 否定问句的日汉对比 大西 智之(389)
24. 汉语语气助词传达功能的语用学探讨 木村 英树(403)
25. 量词的个体化功能 大河内 康宪(426)
- 后记 施光亨(447)

译者(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英语: 方 立(1)

日语: 柴 森(4) 靳卫卫(5) 刘建民(3) 刘 颖(1)
 王 冰(1) 许秋寒(1) 荀春生(5) 阎 瑞(2)
 平井和之(1) 望月圭子(1) 原由起子(1)

东亚语言结构的起源： 东亚和东南亚语言的 地域性演变和历时性发展

桥本 万太郎

1. 引论

在 18 至 19 世纪期间，人们对语言谱系有一种固定的看法，即认为在东亚大陆至少存在着三大群互不相关的语言群体：北部的阿尔泰语、中部的汉藏语、南部的东南亚语。这种看法在当代的语言学家中仍然占统治地位。尽管人们曾有坚定的信念，满腔的热情，并作过不倦的努力和反复的求索，但这三个语言群体是否就构成了三个语系还有待定论。

另一方面，在东亚语言学领域中工作的学者完全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东亚大陆语言的地域性变体和方言几乎可以构成一个语言结构演变的连续体(continuum)，不仅各个语系的情况是如此，在许多方面这些语言在整体上也是如此。因此，当我们根据这个结构连续体考察这些语言和方言时，我们会碰到当代语言学家关注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语言谱系”的概念是什么？

2. 对一体论的挑战

以汉语为例，它是汉藏语系中最大的语种，尽管它有“汉语”这样一个看起来如巨石般浑然一体的名称，但它的语言结构跟它的名称并不完全名实相符。

从它北部的区域性变体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与阿尔泰语相

同的语言特征,而在它的南端,同样也不存在一条真正清晰的界线,可以用来区分汉语和傣族语的音系、形态、句法及词汇的结构。

2.1 藏语是中间状态的语言

在东亚语言的许多句法结构特征中,词序是其中大多数语言的一种主要句法手段,所以我们在此将选择句子主要成分的词序说明其异质性。

设 S 为“句子”,ADJ 为“形容词”,N 为“名词”,ADV 为“状语”(即,一切跟动词联结的句法成分,不仅包括一般副词,而且还包括宾语、补语、方位词以及工具词等其它成分),于是,典型的阿尔泰语和东南亚语的词序可归纳如下:

阿尔泰语 S = $\begin{array}{c} \text{NP} \\ \swarrow \quad \searrow \\ \text{ADJ} \quad + \quad \text{N} \end{array}$ + $\begin{array}{c} \text{VP} \\ \swarrow \quad \searrow \\ \text{ADV} \quad + \quad \text{V} \end{array}$

东南亚语 S = $\begin{array}{c} \text{NP} \\ \swarrow \quad \searrow \\ \text{N} \quad + \quad \text{ADJ} \end{array}$ + $\begin{array}{c} \text{VP} \\ \swarrow \quad \searrow \\ \text{V} \quad + \quad \text{ADV} \end{array}$

连接这些南北两端语系的是现代汉言的北方变体和南方变体,前者以“ADJ+N”和“ADV+V”结构为主,后者留下了大量的“N+ADJ”和“V+ADV”结构。举例来说,“raw fish”在北京说成是“生(raw)+鱼(fish)”,在广州则为“鱼(fish)+生(raw)”(虽然在广州话中,该词是一种习语,今天指一种菜肴,即生鱼片上浇热粥)。这样,上面的公式可修改如下:

阿尔泰语 S = ADJ + N + ADV + V

汉语(北方) S = ADJ + N + ADV + V

(南方) S = N + ADJ + V + ADV

东南亚语 S = N + ADJ + V + ADV

“ADJ+N”与“N+ADJ”汉语方言群大致以长江为界。

更加有趣的是,藏语跟西藏的地理位置相一致,也介于汉语的南北群之间,具有以下的结构:

藏语

$$S = N + \text{ADJ} + \text{ADV} + V$$

换句话说，句中的 NP(名词短语)部分跟汉语的南方群一致，而 VP(动词短语)部分跟北方群吻合。其结果，上面修改的公式应重新排列如下：

$$\text{阿尔泰语 } S = \text{ADJ} + N + \text{ADV} + V$$

$$\text{汉语(北方)} S = \text{ADJ} + N + \text{ADV} + V$$

$$\text{藏语 } S = N + \text{ADJ} + \text{ADV} + V$$

$$\text{汉语(南方)} S = N + \text{ADJ} + V + \text{ADV}$$

$$\text{东南亚语 } S = N + \text{ADJ} + V + \text{ADV}$$

2.2 是“Une triste histoire (一个——悲惨的——故事)”还是“Une histoire triste(一个——故事——悲惨的)”？

汉语史的研究人员会发现，著名的“古代倒装”(古汉语词序倒装)问题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系列世界语言类型的调查已确立了这样一条规则，即在“ADJ+N”的语言里，“PROPER NOUN”(专有名词)总是放在“COMMON NOUN”(普通名词)之前(如，〔北方〕汉语中的 Mao〔毛〕+zhuxi〔主席〕)⁽¹⁾，而在“N+ADJ”的语言里，情况恰恰相反(如，法语中的 le〔定冠词〕president〔总统〕DeGaule〔戴高乐〕)。

顺便提一下，在这一方面，英语结构也是异质的。在北美大陆靠太平洋西北部中的一小部分地区里，下面两种结构可以并存：

Ozette Lake (奥泽特湖), Wynoochee Lake (怀诺奇湖),
Sammamish Lake (萨马米希湖), 等；

Lake Crescent (月牙湖), Lake Washington (华盛顿湖),
Lake Chelan (切兰湖), 等。

因此，即使是出生在这一边缘地区的人，在判断是“Lake Crescent”还是“Crascent Lake”时也觉得非常困难。

语法学家对英语中的这类变化的一般解释是，前一组为定语结构，后一组为同位语结构。与这类变化相关的基本原则是，英语

具有同时允许“ADJ+N”和“N+ADJ”结构的特征。换句话说,说话人发现形容词太长时就把它放在作为中心成分的名词之后,较短时就把它保留在作为中心成分的名词之前。或者,说得更严格一些,英语的形容词总是放在作中心成分的名词后,只是在形容词相当短的情况下才放在前,例如:

“He solved the above - mentioned problems”(他解决了上面提到的问题)〔联接符号“-”应在“above”(上面)与“mentioned”(提到的)之间;否则,这两个词构成一个词的说法就不能成立,“短小形容词”的条件也会被破坏。〕

但是,

“He solved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quite often and most enthusiastically”(他常常能以极大的热情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假如你决心要把所有这些形容词放在作中心成分的名词之前,这也未尝不可,只是需要一种说法,认为这些词事实上构成的是一个成分,于是就有必要把所有这些词联接在一起,如:“He solved the quite often - and - most - enthusiastically - mentioned - above problems”。]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汉语史的问题。殷—(西)周似乎是古汉语词序倒装现象的转折点。司马迁在《史记》的“本记”中所记载的名字,凡在黄帝之后、周以前的统治者,不管是传说的,还是实有其人,词序都是相同的,即 COMMON NOUN(普通名词)+ PROPER NOUN(专有名词)。如:

帝尧 帝舜 帝甲 帝乙,等。

而周及周以后诸王名字的词序是:PROPER NOUN(专有名词)+ COMMON NOUN(普通名词),如: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等。

最有趣味的莫过于用天干取名,可见于传说中的夏末殷初(公元前 1500 年左右)以后的一段时期,如:

祖乙 父丁 妣甲。

作为一种幸运的巧合，那就是，差不多时隔 10 个世纪之后，在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404 年）的齐国，这种以天干取名的作法又重新复活，开国之君太公的子孙都以天干命名，不过，这时期天干总是放在普通名词“公”之前，⁽²⁾而不是其后，如：

乙公 丁公 甲公。*

这种古代词序的踪迹同样可以在地名中找到。举例来说，现代地名“商丘”在河南说成“丘商”，这跟甲骨文中出现的完全一样。

春秋时期魏国的“城濮”跟现代山东的“濮城”是对应的。

假如我们把殷代的“伯—夷”和“叔—齐”译成现代汉语，那么我们是否想到这些专有名词事实上应分别是：

夷（东方蛮人）—伯（伯父或伯、仲、叔、季的排行中最年长者）

齐（齐国）—叔（叔父或伯、仲、叔、季的次序中行三者）

我们相信，我们所知的今天的汉族出现在殷周时期，因此大多数亚洲史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周秦时代使用的谐声字与甲骨文中的字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尤其从这一事实可以判断，在此以前，殷族似乎早已作为一个具有汉族基本特征的民族出现于世。不过，这一点还有待以后定论。

不管怎样，我们相信，汉语中 NP（名词短语）从“N+ADJ”结构演变为“ADJ+N”结构的变化出现于中国历史的早期，因此，帝后名字，如帝尧，以及秦朝以前的地名，如丘商，是这些古老结构中仅见的残存者。

2.3 “Lise-le”（读—这个）还是“(Je) le Lis”（〔我〕—这个—读）？

在 VP（动词结构）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完全相同

* 周武王封太公于齐，太公之子为丁公，丁公之子为乙公，乙公之子为癸公。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编注

的地域演变和历时变化。

在北京与广州,“你比他高”的语法结构有如下的对立:

北京:你(ni) +比(bi) +他(ta) +高(GAO)

广州:你(ney) +高(GO) +比(guo) +他(koy)

主要动词“高”以黑体字出现,其目的是为了更清晰地突出状语的不同位置。这只是状语对比的一例,同样的对立也可见于其它许多状语。

在汉语史里也可观察到完全相同的变化。一篇汉语古文中有这样一句名言:*

吴+败+越+于+夫湫

它可译成如下的现代(北方)汉语:

吴+军+在+夫湫+把+越+军+打+败+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先前出现在动词之前的词语都移到了动词之后的位置上**。VP(动词短语)的这种变化似乎出现于NP(名词短语)的变化之后,发生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中。

看来,当一种语言经历词序变化时,NP(名词短语)总是首先发生变化,VP(动词短语)似乎在此之后,就像英语那样,先前名词的屈折变化事实上已经全部消失,但仍保留了一点点古代的屈折变化系统。^[3]

跟古今变化平行的是同样类型的南北方向上的演变。这一点,事实上从东亚语言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下面列出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1,一般结构:南部为单音节的孤立语,如许多傣族语和方言以

* 语见《史记·伍子胥列传》。——编注

** 这个句子如能译成“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先前出现在动词之后的词语都移到了动词之前的位置”就好了,但原文就是如此:……Where we find what was previously before the verb all transferred to the post verbal position。——译注

及一些东南亚语，北部的阿尔泰语为多音节的粘着语，二者构成对立。衔接这两种语系的是现代汉语方言，这些方言表现出了从单音节的、无后置成分的南方语群到多音节的、有后置成分的北方语群的完美演变。一些基本词变成了多音节词，越往北音节的数量增加越多，这一现象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跟汉语的古今变化完全平行。下面一些表示躯体组成部分的名词就是例证：

古汉语	广州话	北京话
shou(首)	tau - hok	nao - dai - gua - r(脑袋瓜儿)
(ng)e(额)	ngak - tau	nao - men - zi(脑门子)
zhi(指)	shou - chi	shou - zhi - tou - r(手指头儿)
xi(膝)	shi - tau - go	bo - leng - gai - r(波棱盖儿)

从下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存在于广州话与北京话之间的单音节词与多音节词的对比十分鲜明。

广州话	北京话
ngan	yan - jing(眼睛)
lei(脍)*	she - tou(舌头)
geng	bo - zi(脖子)

2, 语音系统：南部的许多傣族和苗—瑶族语言有 10 至 15 种声调，而北部的一些阿尔泰语言只有 3 种音节语调，最多也就是 4 种。处于这两端之间的一种使用于汉语南端的广西方言可区分 10 种声调，⁽⁴⁾而据报道，北方宁夏的一种方言只有 3 种声调。⁽⁵⁾在这二者之间，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从南到北的调类数是逐次递减的。

假如我们计算那些浊声母产生的声调变化，那么古汉语的声

* 《广州话方言词典》(饶秉才等编著，商务印书馆，1981)：“广州话‘舌’与‘蚀本’的‘蚀’同音，由于忌讳而改用‘吉利’、‘盈利’的‘利’，加‘月’旁作‘脍’。人和动物的舌头都称‘脍’。”江浙有些地方和北京话也把作为食品的动物的舌头分别叫“赚头”和“口条”。——编注。

调系统至少有 8 个声调,在现代的标准汉语中已减至 4 个。

3,韵律:由于古汉语是一种非字母的书写系统,我们就无法确定它的韵律特征的确切性质。不过,从汉字的使用来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古汉语是一种典型的孤立语言,就像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汉语区南端及更远地方的情况那样。

难以置信的是,一种语言会是纯粹单音节的孤立语,因为这就意味着该语言中的句子只是一串串连续的单音节词,它们并无其它成分可以标明音位短语的界限。而无这样的标记则是很难辨认(或分析)任何语言中任何句子的基本层次结构的。一些语言学家已作出这样的假设,在傣族语和广州话这样的语言里,每个句子的韵律是我们辨认这种基本层次结构的线索。这就使我们想起,在古代中国,组成佳句时倍受推崇的是保持韵律,如一连串的四字短语或五字短语,如果是五个字,还可以进而作“3+2”或“2+3”的划分。大量运用对仗是划分四字短语和五字短语的线索,这在任何佳句中都能找到。以下面一串无词尾变化,也无一致性关系的词为例: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这一串词可以先在第五个词“郭”和第六个词“白”之间一分为二,因为不难看出,第一个词“青”跟第六个词“白”构成对比,第二个词“山”跟第七个词“水”构成对比,等等。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南方方言之间有着紧密的结构联系。

继续北上,我们会注意到汉语音位短语上的加重重音逐次交叠的现象,在广州往北不远的厦门,我们已经发觉,每个音位短语的尾端部分已失去了它的突出的重要性,它的声调已出现了某些变化。在再往北去的上海,我们可以发现,在每一音位短语中,起始音节的声调总是统制着其他各个音节。在更往北的北京话中,任何

* 见李白诗《送友人》。——编注